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死路一條」，其實就是這層意思。從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到胡錦濤、溫家寶，這「兩代」中國政府領導人都把鄧小平講的這兩句話當作「治國寶典」，不敢稍有偏離。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選擇。

與其同代「革命領袖」相比，鄧小平確實走得最遠。但鄧的局限性也顯而易見，他說的「發展」只指經濟發展，並未涵蓋社會的綜合發展（如教育、環境生態、社會公正等）。奉行單純經濟發展策略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弊端百出且後患無窮，因此這種發展觀已經在70年代後期被國際社會所放棄。更為平庸的中國「第三代領導人」只會蕭規曹隨（亦步亦趨，不敢有所創新之意），一味追求單純的經濟發展。尤為糟糕的是，由於「經濟發展」不容易用單一測度衡量，中國政府就把「經濟發展」這個目標簡化成了可以用GDP衡量的「經濟成長」目標。歷屆中共的黨代表大會與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要把預定經濟成長目標的實現作為中心話題，其原因就在於此。在各級地方政府官員眼中，這個目標又進一步變成了「成長率就是一切」。

「成長率就是一切」又被中共的幹部人事管理體系制度化了，經濟成長率成了考核各級官員政績的主要指標，而一個地區的社會發展程度因此也就被簡化為經濟成長率是高還是低。GDP數字高，說明幹部能力強，可能升遷；數字低，就被認為分管官員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還可能被「末位淘汰」。為了升遷，各級官員自然會想盡一切辦法來「提高」本地區的經濟成長率。

中國官場上有句流行語，謂之「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意指：經濟成長率成為官員政績的考核指標，那麼官員就必然為了升官而編造各種統計數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想要「低成長」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反而成為不可能之事了。

中國的國家計委政策法規司司長曹玉書說過：「從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統計來看，地方確定的平均成長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兩個百分點左右。就是說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會定到9％左右。所以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會定10％。這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後，也有個別是為了表明政績，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把指標降下來[7]」。這位政府官員的話確認了一個事實，即中國各省呈報GDP數據時都考慮到政治需要，絕不可能呈報一個比中央政府確定的經濟成長率目標低的資料。他還暗示，不管地方政府呈報的GDP成長率是多少，國家統計局最後會假定其中屬於誇大的部分平均為兩個百分點。

但是，曹玉書沒有說明的是，國家統計局以什麼為依據將地方政府呈報的GDP增長率平均扣除兩個百分點，為什麼不扣除三個百分點或更多呢？這種方式也讓人不由得不懷疑國家統計局數據的可靠性。其實，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經濟成長率有一個不可逾越的底線，那就是一定要高於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經濟成長目標。國家統計局作為政府在統計數據方面的「喉舌」，公布的數據只能論證政府如何「成功地實現了預設的經濟成長目標」，絕不允許與事關政府合法性的經濟成長目標不一致。所以，不管真實的經濟情況如何，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成長率永遠不會低於政府預定的經濟成長目標。只不過為了取信於人，顯示其精確性，這一數據會精確到「小數點」，與年初定的目標略有出入而已。

也因此，中國才會出現宏觀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一方面，經濟成長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成為世界經濟中「一枝獨秀」的奇葩；但與此同時，市場需求不足，物價持續走低，多數企業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工不足，產品嚴重積壓，失業規模不斷擴大，並且正由低素質勞動力大量失業擴展至知識型勞動力（大學畢業生）大規模失業。按照宏觀經濟理論，一個國家出現經濟的強勁增長時，必然是市場需求旺盛，物價持續走高，就業率不斷上升，而中國卻出現了GDP成長率「一枝獨秀」，而需求、物價、就業等其他指標卻持續下降的局面，可信的解釋是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不可靠。

3. 中國政府要告別「GDP崇拜」？

「中國經濟全球一枝獨秀」與「GDP連續保持20多年高速成長」的神話迷惑了國際社會，加上中國2003年與2005年又連續發射「神舟五號」與「神舟六號」太空船炫耀國力，於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紛紛要求中國的人民幣升值。面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政府只好承認國內經濟有「一些問題」，人民幣升值將會導致中國經濟發生嚴重困難，一旦中國經濟發生困難，對世界穩定都沒好處。顯然，中國政府也明白，誇大經濟成長率固然有很多好處，譬如吸引大量外資到中國，但也要付出代價，譬如，國際社會可能要求中國的貨幣升值，還可能減少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於是，中國政府最近決定對中國的GDP神話降溫。這就是本章開頭提到的中國政府宣布要修改GDP數據計算方法、增加其可信度的原因。這樣做可能會減少中國的工業增加值的成長率，因為過去若干年為中國工業增加值的成長有不少可疑之處。

當然，中國政府的這個決定會沖銷「神舟五號」升空帶來的負面影響，還可以讓中國繼續享受發展中國家才能得到的經濟援助。這些援助屬於「不要白不要」之類的好處，中國人民雖然未必從中得到多少實惠，但中國政府卻可以將這些不費力得來的經濟援助轉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手送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從而換得那些國家在聯合國各組織中投票支持中國。這種好處顯而易見：2003年12月10日，人權狀況極為糟糕的中國，卻居然得到了聯合國人權組織頒發給鄧小平兒子鄧朴方的人權獎，這獎項五年頒發一次。這真讓可憐的中國人民再次大吃一驚，懷疑這人權獎的價值究竟何在。

專制者胸前掛上人權獎勳章，完全是「金彈外交」的結果。中國政府多年奉行機會主義外交政策，早就深深懂得「在富國面前裝窮，在窮國面前扮闊」的雙重好處。何況，現在全世界的游資無處可去，往往把中國當作一個投資選擇，雖然也有企業在中國投資失敗後開始醒悟，但新湧去的投資者數量還是很多，所以中國政府適當地表現一下「誠信」，聲稱要「告別GDP神話」，並不會影響外資在短期內繼續湧入中國。

中國政府作出這個決定，其實還有中共「第四代領導人」一個不能明說的「政治盤算」，即對「第三代領導人」的政績來一次「清盤」。中國的重重危機正像筆者在《中國的陷阱》一書裡所說，而江澤民前總書記對自己任內政績的評價卻是「十三年光輝成就」。現實和這一自我評價正好處於兩個極端：現實情況是「很糟糕」，而江澤民的總結卻是「非常好」。第四代領導人當然知道何者為實，何者為虛。如果完全承認江澤民為自己填寫的「成績單」，那麼「第四代領導人」就只能把「第三代領導人」遺留下來的所有麻煩和危機都算作自己任內之事，深諳中國政治鬥爭殘酷性的新一代領導人還不至於如此缺乏「政治智慧」。但是，他們也不能自打耳光，承認中國政府多年來在GDP數據上造假，於是就選擇了「放棄GDP神話」這一決定，趁剛「接班」之際，從就業、社會福利、環境生態、「成長不等於效率」等方面入手，指出中國目前存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在的諸多問題，既避免為「第三代領導人」承擔爛帳，同時也為萬一將來「算政治帳」時預留退步。

新任領導者接班時的「盤家底」，是中共極權政治中各級政府官員常玩的老把戲，只是因時機、形勢、領導者個人的實力不同，幾代領導人在玩這套把戲時的手法也各有不同，流風所及，早已遍及各級政府部門。90年代下半葉開始，為了避免政治鬥爭造成過多的人事衝突，在政府的縣、鄉一級以及國有企業，早已實行「領導離任審計責任制」與「國有企業負責人離任審計責任制」。每逢主管官員們離任、接任，這種審計一般要做兩次：一次是離任官員為自己做的，這份「成績單」當然全是「優秀」；另一次則是繼任官員為前任官員做的，評價「對事不對人」，指責從不針對前任官員本人，但其業績卻是毛病百出。上級政府一般不會根據後一份「成績單」來追懲離職他任的前任官員，繼任者如此做的目的只是為了擺脫前任留下的諸多問題的責任，為自己今後的升遷「買」一份「保險」。

中國的高層「政治家」們自然不能像下屬官員那樣有失「風度」地大「清盤」，但委婉一點地做點「清盤」工作，只要不「撕破臉皮」，自也無礙大局，這就是中國政治中的「太極拳」功夫（太極拳為中國功夫之一種，以柔見長）。

二、GDP神話光環下掩藏的巨大陰影

其實早在90年代中期，一向偏重於從經濟角度評價社會發展的經濟學界就已經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用GDP來衡量經濟成長固然可以，但用它來衡量社會發展卻有很大的問題。達成這一認識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的醒悟過程中，經濟學科不是先鋒，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早就對此提出質疑。1968年，美國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競選總統時說，「GDP衡量一切，但並不包括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這種東西」。

事實確乎如此，中國就是個最好的例證。

1. GDP不衡量經濟成長的生態成本

GDP不衡量經濟成長的社會成本，指的是如下事實：本來應該由企業承擔但卻讓企業之外的社會承擔的成本，在GDP統計中是不考慮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GDP從來就不反映資源耗減和環境損失。

中國連續25年的GDP成長其實是建立在生態環境嚴重毀壞之上：全球10大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8個；中國的城市河流70%受到污染；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過健康標準的環境中；很多過去從不缺水的中國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開始抽取深層地下水，這樣的地下水只能供8到10年使用，抽完後地下含水層很難重新蓄水；眾多農村人口不得不飲用污染了的地表和淺層水源；國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由西向東推進；各種災害爆發的頻度和烈度越來越高。

中國的生態污染絕不止上述幾個事例，只要閱讀國家環保總局每年的年度報告，對中國的生態污染現狀就會產生觸目驚心之感。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要占到當年GDP的8%；中科院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到GDP的15%。

潘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轉述專家的話：由於廣大西部和生態脆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弱地區難於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1.5億人口淪為生態難民[8]。

中國的GDP是在成長，但社會財富和福利水平反而下降。筆者根本不用費心尋找資料，只將手邊一篇報導信手拈來，就可說明問題。上海《新民周刊》2003年11月24日登載的「湘鄂贛血吸蟲驚悚調查」告訴讀者：北宋名相范仲淹在「岳陽樓記」描繪的「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鬱鬱青青」的洞庭湖（位於長江中游，號稱中國第一大湖，周邊由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環繞），現在卻成了「八百里疫水包圍沿湖四百萬生靈」，不但不能讓人類再享漁樵之樂，飽覽山水之美，反而成了血吸蟲病的源頭。這篇報導讀後讓人慘然惻然，淒然難忘。這裡只列舉一段資料：

湖南省現有血吸蟲病人21萬人，占全國血吸蟲病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洞庭湖區現在僅病畜就有5萬頭，有螺面積3,915萬公頃，占全國現有釘螺分布面積的52％。且泥沙淤積，洲土不斷擴大，每年有螺分布面積還以60萬公頃至90萬公頃的速度增長，因為血吸蟲病的源頭釘螺每年的繁殖率是一對釘螺產卵25萬隻，而湖南據說還不是血吸蟲肆虐最嚴重的區域，因為民謠說，全國疫區數湖北，湖北疫區數荊州。

中國衛生部每年很「負責」地做著官樣文章，宣稱「實行血吸蟲病急性感染『疫情周』報告和零報告制度」。這一制度是否生效，只要看看基層官員的回答就知道了：「填數字呀。數字出幹部啊。滅螺隊全部解散多年了，上面那些幹部早就習慣『估報』、虛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報了。這，還不是公開秘密？」

中國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長肖東樓於2003年9月28日承認：中國血吸蟲疫區釘螺明顯擴散，新疫區不斷增加並向城市蔓延，血防形勢「異常嚴峻」，繼續威脅著中國的「1億人口」。

這種因生態污染而導致的大面積疫病人口，宛如嚴重的社會潰瘍，正在中國的肌體上生長，並嚴重摧毀中國一些區域的社會生活，但是GDP這一數據卻根本不能反映中國經濟成長的巨大代價——生態環境嚴重污染，不少地方已經不再適合人類居住。

讀者也許會奇怪，這種「暴露社會陰暗面」的文章，按照中國政府目前對新聞控制的嚴厲程度，不是很難發表嗎？確實，湖南那麼多報紙，沒有敢率先寫這題材的記者。但這位記者很聰明地利用了地區利益的不一致：《新民周刊》在上海，居長江下游，洞庭湖在長江中游。記者在文章中借基層血吸蟲防治（簡稱「血防」）人員的口說：「我們至今還不願意相信，血防真完了？任憑這麼濃稠的疫水爛到下游，爛到江蘇、上海去？」而洞庭湖歷來有作為長江分洪洩洪的「蓄水池」之功效，這湖既然成了浩浩蕩蕩的八百里疫水，上海江蘇最後總難免池魚之殃。為了保住上海的地方利益，揭揭「兄弟省市」的爛瘡疤沒什麼不可以的，況且湖南、江西是弱地方政府，哪敢與有硬挺大後臺的大上海鬥？只好自認晦氣了。

2. GDP不能衡量資源配置的效率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GDP的增長得益於政府通過財政支出興建公共工程而拉動的經濟增長，因此出現了很多毫無實際效益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即為政府裝點門面的工程）。結果是GDP在不斷成長，但投資嚴重浪費，工程建成後效率極低。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置的生產線、賣不出去的「爛尾樓」（蓋了一半因沒有買主而停止施工的建築物）、空無人跡的新建機場等，在今日中國隨處可見。

這裡僅舉中國廣東省珠海經濟特區的幾個著名大工程為例。珠海經濟特區在中國的名氣與重要性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僅次於第一大特區廣東深圳，但「政績工程」也非常出名。1988年，珠海市市委書記兼市長梁廣大讓珠海市政府創辦了「珠光集團」，主要業務是吸收國外資金，投資珠海當地企業。1996年「珠光集團」在美國發行2億美元債券，1998年「珠光集團」下屬的「珠光發展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並與許多大金融機構、大財團建立了穩定長期的合作關係。十多年來，「珠光集團」先後從國內外著名銀行和金融機構如標準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摩根・斯坦利公司、李曼兄弟銀行（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以及「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等數十家銀行，貸款7.5億美元，支持珠海市的道路、橋樑、機場、體育場館及其他市政建設。珠海經濟因此得以快速發展，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一時間贏得國內外一片讚揚之聲，國外投資銀行對「珠光集團」自然也刮目相看。

然而，這些工程很多只有觀賞價值，卻不能拉動珠海市的經濟發展。花費8億美元鉅資建設的「珠海國際機場」至今只有少量國內客貨飛機起降，該機場一年的客流量比香港國際機場一個星期的客流量還少。事實上，早在籌建珠海機場之時，就有人提出，近在咫尺的香港、廣州與深圳都各有一個機場，這三地之間的飛行航程除去起降時間只要五分鐘左右，沒有必要在這幾個地方附近再興建珠海國際機場。但是，梁廣大一定要建，於是就出現了這個可能永遠不能充分利用的珠海機場。「政績工程」當然不止機場一處。為了給珠海找到支撐經濟發展的「新興產業」，梁廣大還在珠海建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了一條多功能的國際最高水準的賽車道，想以賽車來帶動珠海經濟發展，但一直沒能找到參賽者在珠海舉辦國際賽車比賽。這些「政績工程」當年都是珠海市GDP成長的支撐點，耗資驚人卻至今未能產出效益，成為中國最典型的浪費工程[9]。多年來，是娼妓業與賭博業的興旺在支撐珠海經濟的「發展」。有人曾經挖苦地說過，珠海市公務員的工資中，有30％來源於這兩大行業的貢獻。

遍布全國的類似珠海市的這些「建設成果」，雖然暫時拉動了中國GDP的增長，卻不能為中國社會最急迫的就業問題稍做貢獻，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GDP連年高速增長，而與此同時就業情形卻急劇惡化的原因所在。從2004年開始，中國城鎮每年需要安排就業的勞動力達2,400萬，而每年能夠提供的就業工作僅為1,000萬左右，每年就業缺口有1,400萬，加上1.5億農村多餘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面臨巨大壓力[10]。

中國社會也因此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整個社會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動力過剩，許多研究生與海外歸來的留學生都無可奈何地成了失業者。2002年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是53％，2003年全國212萬大學生畢業時的就業率只有50％。如果考慮到中國政府向來「報喜不報憂」這一「特色」，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就業情形恐怕比報導的更為嚴峻。實際上，大學生就業的「嚴冬」還剛剛開始。中國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計畫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長，2004年畢業生為260萬，2005年達320萬。即使按照高度樂觀的畢業生就業率70％推算，這兩年將分別有80萬和100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11]。儘管中國政府已經不公布失業大學畢業生的具體資料，但其就業的嚴峻形勢卻從種種報導中可見一斑。據統計顯示，2006年南下求職的畢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業生預計達到40萬，但是其中只有1/8的求職者能夠在廣東就業。而廣東省是全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省份，其他省份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更是相對稀少[12]。而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日益下降，月薪僅為1,000元，身價等同農民工[13]。

3. GDP不能衡量社會財富的分配

中國改革以來，雖然造就了少量富人，但同時也在大量累積著貧困。目前中國15％的富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85％，而且貧富差距還在不斷擴大，2001年官方公布的基尼係數是0.458[14]，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社會仇恨正在一點點凝聚。而此後幾年儘管貧富差距還在擴大，但政府公布的基尼係數卻一直維持在0.4這一水平。而這一中國人用肉眼可以觀察到的社會弊端，GDP卻反映不出來。筆者的《中國的陷阱》（修訂版於2003年由TAIWANNEWS新聞公司出版）一書對此有詳細說明，這裡不再重複介紹。

4. GDP不能衡量社會福利的增長

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否健全也是GDP無法反映的。近年來中國政府雖然宣布中國GDP連年增長，但與此同時，大量退休工人領不到養老金、大批人因生病沒有醫療保險而陷入絕境。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資料，早在1996年6月底，中國已有76.9％的職工和94.7％的離退休人員參加了社會保險[15]，似乎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相當順利。但事實上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名存實亡，許多「個人賬戶」只是一個名義賬戶，其中並沒有資金，由此形成了一個內行人士稱之為「空賬」的現象。有關資料顯示，「空賬」的規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模在逐年擴大，1997年為140億元，1998年為450億元，1999年已經達到1,000億元以上。而且中國目前社會保障體系的養老保險的當年收入不能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退休金，這種情況表明社會保障體系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累積[16]。尤其是近年來由於中國政府高度腐敗，被稱為「養命錢」的養老保險金成了少數人矇騙、挪用、利用職權冒領的對象。2003年是中國「第一次養老金支付高峰」，年初中央財政對養老保險金計畫補助350億元，連負責發放養老保險金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都知道這一補助嚴重不足[17]。中國保險協會會長項懷誠（前財政部長）曾多次提到，到2004年，中國積欠養老保險金高達1兆元[18]。

GDP同樣不能衡量醫療保險體制是否完善。中國城市的醫療保險體制存在諸多問題，農村醫療保險體制更是陷入崩潰狀態。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顯示，在191個國家中，中國在衛生費用負擔公平性方面排在倒數第4位，在衛生系統的總體績效評估方面列第144位。

醫療保險的覆蓋率甚至比養老保險還要低。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到2003年底，參加全國醫療保險的人數僅占城鎮人口的20%，而農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夠享受到合作醫療的保障[19]。

儘管占全國人口20%的城市居民號稱享受著中國2/3的醫療衛生資源，但一項調查顯示，城市人口中還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應該看病卻不看病，大約三成的老百姓應該住院卻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貴。每年中國「兩會」期間，不少「兩會」代表都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解決公共醫療體制中的嚴重問題[20]。

而農村的情況就更悲慘。1978年中國改革以前，農民的醫療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保障主要依靠合作醫療體系。改革以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農村合作醫療體系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合作醫療覆蓋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驟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全國農村大多數村莊的合作醫療都瓦解、停辦了，村衛生室（合作醫療站）變成了鄉村醫生的私人診所。農民失去醫療保障後，由於醫藥費用支出的成長大大快於農民收入的成長，生病後普遍處於缺醫少藥的狀態。從1990年到1999年，農民平均純收入成長2.2倍，而每人次平均門診費用由10.9元增加到79元，住院費用由473.3元增加到2,891元，分別增長了6.2倍和5.1倍。農村中因病致貧的農民占貧困戶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60%以上。即使在經濟發達、富甲一方的蘇州地區，仍有20%以上的農民無力治病[21]。

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已經持續了20多年，但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撥出的合作醫療經費只是象徵性地每年500萬元，各級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也是每年500萬元，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人每年約1分錢。這區區1,000萬元人民幣（約合120多萬美元）的合作醫療費用用於解決10億農民的醫療保健，連杯水車薪都談不上[22]。

也正因如此，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才在一個關於醫療保險的調查報告中總結說，在同等水平的發展國家中，中國醫療費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相當高，但是醫療的公平性卻在世界上幾乎是倒數前幾名之內。因此「中國醫療保險體制改革基本不成功，醫療衛生體制市場化是個錯誤」[23]。

上述各方面實際狀況卻被掩藏在GDP神話的光環之下。當中國的GDP成長伴隨著上述諸方面狀況的迅速惡化時，中國的經濟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增長讓社會付出了什麼代價？對中國的社會發展又起了什麼作用？

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了一套衡量國家進步的指標：例如，可以計算財富分配的狀況，若財富分配在公平的標準之外，必須扣分；可以計算社會成本，如失業率、犯罪率等；要嚴謹地區分經濟活動中的成本與效益，例如醫療支出、超時工作是社會成本，不能算做對經濟有貢獻。1995年，「聯合國環境署」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社會（目標是消除貧窮）、經濟、環境、政府組織及民間組織等方面的指標。在會計行業，國際社會也提出了「社會責任會計」和「環境會計（綠色會計）」的新會計理念，其計算方法是要在現有統計基礎上扣除經濟活動產生的外部社會成本，扣除所計量資源的耗費，以計算國民經濟成長的淨效應。

判斷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必須測算這些指標之後才能得出結論。中國政府單純用GDP成長率宣傳中國的成就，只能矇騙不懂經濟指標的媒體與社會公眾，當然，更能矇騙那些霧裡看花的外國觀察者與投資者。

三、中國的統計數據之謎

為了讓「中國經濟繁榮」顯得更真實，中國各級政府常常在統計數據上精心造假。那麼，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是否可靠？為了便於讀者瞭解中國統計數據造假的一些基本情況，這裡作一點簡單介紹。

1.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幾根舌頭」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研究中國經濟，離不開中國國家統計局每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然而，如果只根據這本統計年鑑的數據判斷中國的經濟狀況，恐怕得出的結論會與中國現實相去甚遠。因為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功能並不同於民主國家的政府統計機構：它不僅負責蒐集、處理、公布統計數據，同時還扮演著「黨的喉舌」這一政治角色。它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用統計數據「營造」出中國經濟繁榮的印象。

國家統計局有公開發布統計數據的出版物，這就是各地書店都出售的歷年《中國統計年鑑》和《中國統計摘要》。公開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中列出的統計數據，其特點是「報喜不報憂」。但一般社會大眾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的官員還有另一套資訊來源，那就是由國家統計局分發、只在政府機關「內部」流通的分析報告。凡是政府認為屬於「負面」的數據、或者可能導致對中共當局不利結論的數據，在中國都屬於「國家機密」，不能公開，而只能在「內部」出版物中刊登，「供領導參考」。

國家統計局的官員有一項任務，就是要不定期地寫「統計分析報告」。這些報告有一套固定的模式，通常以「經濟形勢如何好、取得了多少成就」開頭，然而，內行都知道，真正有閱讀價值的往往是這些分析報告的後半部分，在「但是」這一轉折詞之後，會列舉出一系列負面消息和不利判斷。在國家統計局內部，評價這些「分析報告」好壞的標準並非報告中的分析是否深刻，而是分析報告能否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如果有某「中央領導」在一份國家統計局的「分析報告」上「作了批示」，就成為國家統計局的「工作成就」；「中央領導」的級別越高，「工作成就」也就相應越大。國家統計局官員們的業績評價和職位升遷，很大程度上與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他們的「分析報告」是否受到「中央領導」的賞識有關。

國家統計局有幾種「內部」出版物，其中保密級別最低的是《統計資料》，它屬於「機密」級，發送至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統計資料》的功能主要是向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通報經濟情況，同時也為宣傳部門提供素材。在中國，級別低的媒體看不到《統計資料》，自然也不可能摘抄刊登，《人民日報》、《新華社》、《經濟日報》是少數幾個能夠看到《統計資料》並摘抄刊登有關中國經濟情況數據的媒體。還有一些部級機構的媒體有時也這樣做。中國有份由「國務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經濟時報》，前幾年會不時地將《統計資料》的片斷登在「報眼」上（報紙頭版右上方位置），善於閱讀者可以從中得到不少資訊；由於它公布的數據屬於分類資料，具有研究價值。中國的研究者如果要分析及時的宏觀經濟情況，不可能等到一年後《統計年鑑》發表之時，就只能使用這幾家媒體透露的資訊。當然，一些研究者因有機會接觸到《統計資料》，有時候會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加說明地引用若干資料。這種情況一旦被國家安全部門注意到，輕則受到警告，重則可能被指控為「洩漏國家機密」。

中國的官方媒體發布宏觀經濟數據、介紹經濟形勢時，經常是用一套固定的宣傳式語調，不能說這種語調是官方媒體經濟記者的發明，因為國家統計局訓練官員寫「統計分析報告」時就是按照這種語調和文風訓練的。官方媒體摘抄時自然就原封不動地照搬了。由此可見，國家統計局的「喉舌」功能與官辦媒體的「喉舌」功能其實沒有多少差別。

國家統計局內部出版物當中保密級別最高的是《統計報告》（保密級別是「絕密」），通常只送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內副委員長（非中共黨員的副委員長不在此列）等高級領導人閱讀。由於《統計報告》的功能是向政府高層報告真實的經濟動向，所以會涉及最敏感的數據和判斷，其中的真話要多一些。但在中國能看到《統計報告》的人不超過一百人。

由於國家統計局有「幾根舌頭」，同一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就被詮釋得面目不一。

2. 統計數據為何「年年打假年年假」？

既然中國的國家統計局也是「黨的喉舌」，各地官員又因升遷之需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惡性循環，統計數據造假也就成為當今中國司空見慣之事。只是有時造假太過荒謬，又被一些記者曝光，才會引起社會批評。譬如，新華社一個記者在某一年5月份去雲南某縣委採訪，當時在縣委書記辦公桌上竟然放著當年12月的全縣工農業總產值統計數據；又如，某縣連續三年呈報的綠化面積竟超過該縣土地面積的總和，等等。此類「負面」消息一多，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因此每年3月北京「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協委員會議）期間，統計數據的真實性就成為一些全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質疑的重要內容。在這些壓力下，國家統計局不得不公開表示要「完善統計法規、與國際接軌」。中國政府每年都要實施「統計打假」，派遣統計執法檢查組到各地去巡迴檢查，宣稱要矯正地方政府虛報政績之風。只不過由於上下級政府與官員之間那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關係糾纏不清，這種統計打假往往成了虛應差事，沒有任何實際效果。更何況，國家統計局本身也是造假者，自己身不正，又豈能糾他人之偏？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至此，可以做出結論：只要中國的政府統計系統的「喉舌」功能不變，「報喜不報憂」的工作特性不改，製造假數據就是一種政治需要。不過，造假技巧確實也在不斷進步，例如經常透過種種「內部規定」將偽造數據「合法」化，這早已經是政府各級統計部門的公開秘密。

在一堆數據迷霧中，要發現並準確說明中國經濟真相，確實相當困難，尤其是對局外人來說確非易事。不僅外國學者無法獲知中國的統計機構系統性偽造數據的具體做法，就算是非常熟悉中國統計行業內部情況的專家，也需要憑藉經驗、技巧與耐心，才能發現一些假造統計數據的痕跡。這裡列舉一個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的中央銀行合作偽造金融統計數據的例子，以供讀者參考。

中國的銀行系統因為壞帳太多，常年處於嚴重虧損狀態。1992年中國全國銀行當年的淨虧損（盈餘扣除虧損後即為淨虧損）達1,178.3億人民幣，相當於貸款餘額的5%，銀行系統的全部資本金都被當年淨虧損沖銷。在自由經濟國家，這意味著銀行的全面破產。在中央銀行編制的「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平衡表」中，虧損總額是由「當年結益」（Current Balance of Profit and Loss Accounts）這一項目反映的。由於這一統計表的各項目彼此相關，不容易偽造單一項目的統計數據，所以國家統計局不得不將中央銀行編制的1992年「國家銀行信貸資金平衡表」公布在《中國統計年鑑》當中，這一鉅額虧損的真相因此被洩漏。此後3年（1994～1996年），中國銀行系統的虧損總額繼續擴大，為了遮掩這一真相，國家統計局在編制這3年的統計年鑑時，將「國家銀行信貸資金平衡表」的「當年結益」留空，什麼數字也不填。但這種不正常的「數字搗鬼術」不能年年都上演，於是國家統計局與中央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銀行合作修改「國家銀行信貸資金平衡表」中的數據，在1997年重新恢復公布該表中「當年結益」項的數據。修改以後，這一項目在1994年、1995年都呈現數額很小的盈利，但在「其他」這一項卻呈現2,526億（1994年）、3,647億（1995年）的負數。顯然，這是把真實的虧損掩藏在「其他」項的負數裡，而偽造出「當年結益」項的正數。到1996年，中國銀行業的虧損更加嚴重，不僅在「當年結益」項上再次出現虧損，而且在「其他」項上出現了占當年貸款餘額9％的負數（總額為－5,418億）。這樣，原來的數據偽造方法已經無法掩蓋銀行嚴重虧損的真相，於是國家統計局與中央銀行再次合謀偽造數據，取消了1997年的「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平衡表」當中「當年結益」一項，銀行的虧損額被掩藏在其他各項當中。自此以後，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金融統計表格中，人們再也看不出中國銀行系統經營的結果是虧損還是盈餘。這種任意改變統計項目以便隨時掩蓋真相的做法，堪稱全世界獨一無二。

上述問題是筆者在計算中國金融系統真實壞帳率時遇到的。當時仔細查閱1992年到2002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卻因國家統計局存心在統計項目上搗鬼，筆者不得不就教於方家（內行），這位精於中國統計行業內部情況的內行人士花了一整天時間，才算是理清了這一團數據迷霧。

限於篇幅，筆者在此對中國數據造假不再多加討論。但根據中國的政治遊戲邏輯，可以斷定，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放棄了前任賴以顯示合法性的GDP神話，自會有經濟學家與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論家」們再為他們創造一個新的神話。極權政府需要神話，這不僅僅是自慰的需要，更是為了營造其國際形象的需要。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1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484.

2 資料來源於歷年《中國統計年鑑》。

3 新華網，2005年12月20日。

4 「世紀末的彌天大謊」，《中國青年報》2000年3月22日；「張二江吹牛記」，《南風窗》（半月刊）2002年6月上。

5 「昏官王懷忠與『GDP牛皮』」，《南風窗》2003年12月上。

6 轉自中華網，www.china.com，作者：齊魯沐風，日期：2003年12月23日。

7 「GDP平均增長率：為何地方比中央高2個點？」，《21世紀經濟報道》（廣州），2003年2月18日。

8 「中國生態的盛世危言」，《南風窗》2005年2月（下）。

9 「梁廣大當年玩過頭，珠光今天要破產」，《多維時報》2003年12月21日～27日。

10 《中國經濟周刊》2005年第一期。

11 中新社北京七月十一日電，記者閆曉虹，「問卷調查顯示 大學生就業難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http://news.tom.com 2003年7月13日5時50分。

12 《資訊時報》，2006年2月19日。

13 「大學畢業生月薪跌至1,000元 身價等同農民工？」華聲在線，http://hs.hnol.net。

14 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見《經濟日報》2001年10月29日第7版。

15 新華社1996年8月5日電。

16 《經濟研究》2001年第5期，孫祁祥：「『空賬』與轉軌成本」。

17 《財經時報》2003年7月12日。

18 見www.business.sohu.com，2004年6月26日12:23。

19 「社保制度健全加速進行時」，《國際金融報》2004年3月10日。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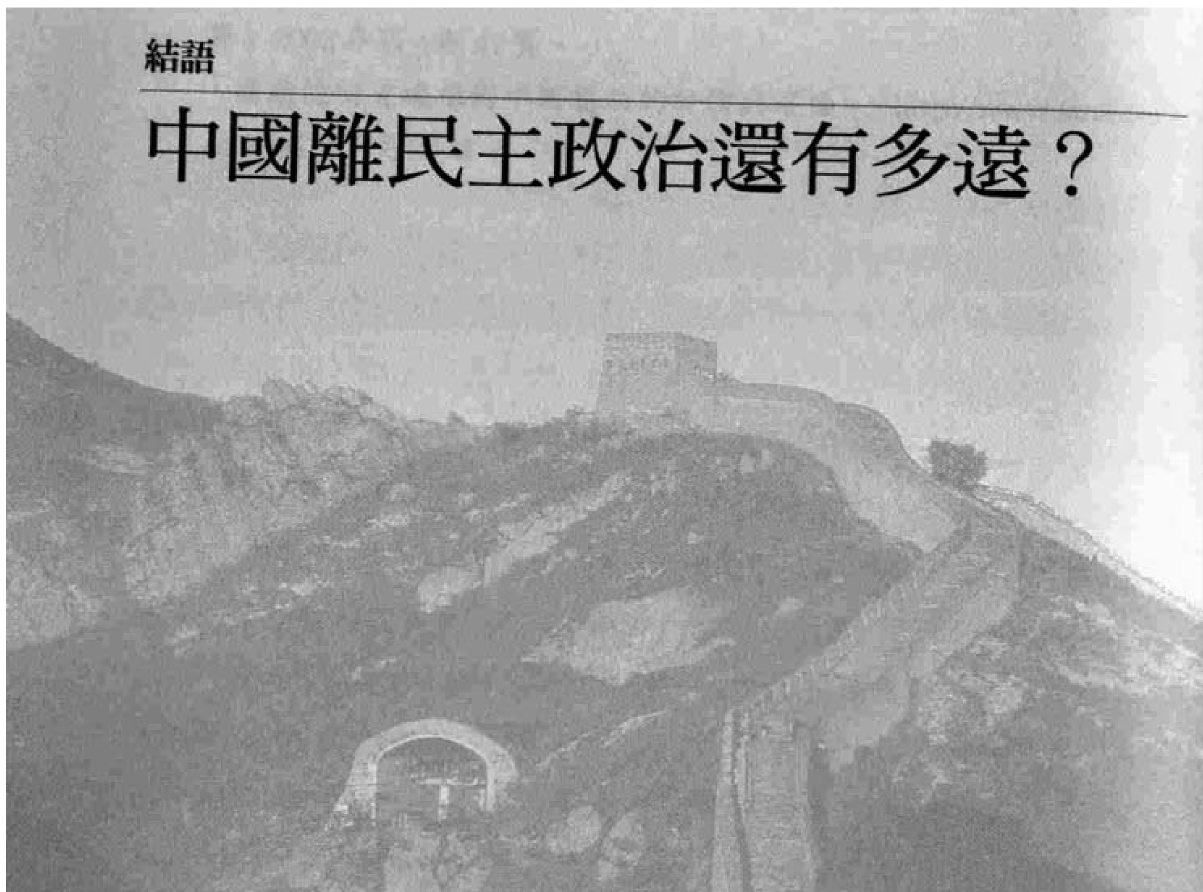
20 「國務院研究機構對中國醫改的評價與建議」，http://www.sina.com.cn 2005年7月29日。

21 宋斌文、熊宇紅、張強：「當前農民醫療保障的現狀分析」，《當代中國研究》（美）2003年第4期。

22 李衛平等，「我國農村衛生保健的歷史、現狀與問題」，《管理世界》2003年第4期41頁。

23 「國務院研究機構對中國醫改的評價與建議」，http://www.sina.com.cn 2005年7月29日。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中的部分精英總是在不懈地追逐「民主政治」，但「民主」宛如夢中女神，中國人只能看見女神的裙裾飄動，卻始終無法將這尊女神請入中國的政治殿堂。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在最近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少曾經到過中國的人，不管他們的走訪是否深入，總是以為「我瞭解中國」。芝加哥大學一位社會學教授（華人）就曾對我說：「我到過中國，還搭計程車到上海郊區看過，這總應該算是瞭解中國了吧？」對此問題，我啼笑皆非，因為我知道，任何學科都不會將搭計程車觀看某地算作「實地調查」。

對於觀察家們來說，如果總是被一些表面現象牽著鼻子走，就會墜入「盲人摸象」那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境地。因為表面現象看得再多，也畢竟只能瞭解「大象」軀體的一部分。筆者引用這個寓言，是因為許多人往往分不清「見微知著」（從小處觀察大處）與「盲人摸象」的界限在哪裡。

毫無疑問，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任何人只要去中國的幾個大城市「走馬看花」式地旅遊一趟，幾乎都可以感覺到這個有古老歷史的國家正在發生巨變。但正是在這不斷奔湧的時代激流下面，中國也有始終不變的東西。而這始終不變的東西，正是被這個國家的政府動用一切力量全力護衛的專制政治制度。

一、中國的「變」與「不變」

本書是筆者繼《中國的陷阱》之後完成的第二本書。從這兩本書的研究分析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這些年來發生的變化中，變化最大的是資源分配方式與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由原來的公有制一統天下，變為多種所有制並存；由於資源分配的大權仍然掌握在各級政府官員手中，從而使得政治精英集團成為改革中最大的得利集團。而中國的政治體制則幾乎沒有任何本質變化，仍然是一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黨專政。近幾年總是被不少人鼓噪的那些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前奏」，最多只能算是行政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變革無關。

行政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最本質的區別在於：行政體制改革改變的只是政府的管理方法與部門設置、人事任命方式等等；而政治體制改革改變的卻是政府權力的來源，即政府權力來源是民主選舉，還是來源於用暴力奪權後建立的一黨專制。

中國政府善於編織各種謊言，而且從來不會因為撒謊而感到難堪，但臉皮也還未厚到宣布自己實行了「歐美式民主政治」。2003年12月1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面對聽眾的提問也只得被迫承認：「中國人民至今還未做好選舉領導人的準備」。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中國民眾素質太低，所以不具備選舉國家領導人的能力。溫家寶的談話，與20世紀中國歷代政治精英拒絕實行民主政治的藉口如出一轍。但中國政府的行為卻又與此藉口相反：目前在人口總體素質最低的農村裡，中國政府恰好允許在那裡實行村委會選舉；而在人口素質相對要高的城市裡，中國政府至今還沒有任何鬆動跡象。這一事實說明，不是因為中國人素質太低，不配享受民主政治，而是中國政府至今還未「做好放棄獨裁的準備」。

如果就政治體制的特質來看，中國現在奉行一種與舊極權政治不同的新極權政治。這種新極權政治與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一脈相承。毛時代的極權主義體制是步蘇聯後塵建立的。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非常精確地描述過這種極權主義政治的特點：「極權主義當權，它必然發展出一套嶄新的政治制度，也在它權力所及的地方，摧毀一個國家所有的社會、法律和政治的傳統。不論任何一個民族的特有傳統，或者其意識形態的精神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泉源為何，極權政府往往把階級轉變群眾，而且，藉著群眾運動，依賴一黨專制體制取代了政黨制，同時把權力核心從軍隊轉移到警察手裡，也建立起一個以征服、統治全世界為導向的外交政策。……傳統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識，以功利為目的諸種範疇都無法幫助我們處理、判斷，或者預測它們的活動途徑。」[1]

因為漢娜・阿倫特的著作對極權體制的剖析一針見血且深入骨髓，所以她的著作至今未能在中國翻譯出版，因為這些分析會讓人產生許多對中國政府不利的聯想。而那些對「貧困者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論表示充分理解的外國政治學者，卻能在中國獲得不少被介紹的機會，例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鄒讜（美籍華人，已故），因為他在著作中反覆表示對「中國的專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深深理解，符合中國政府的需要，因此曾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鄒讜對中國「文化大革命」與「農業學大寨」的深情讚美與嚮往，足以讓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瞠目結舌。

以漢娜・阿倫特概括的特點來觀照當今中國，就會發現上述極權政治的本質特點在中國其實未曾發生變化：

一黨專制仍然是中國政治的特點。從世界各國現有的憲法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部「憲法」：中國政府主持制定的憲法與中國共產黨互相賦予對方以權力的合法性，憲法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這一憲法又賦予中國共產黨以「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地位，最高政治權力由中國共產黨繞了一個彎自己授給自己。最重要的是，一旦中國共產黨認為憲法條款不符合它的政治需要，立刻可以修改。中國的制憲歷史也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段歷史。日本於1868年明治維新中確立的君主立憲政治體制，曾經成為清王朝效法的榜樣。而日本1945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年以後的「和平憲法」更是促使日本走上了現代民主政治之路。但作為日本鄰國的中國，在這一百多年當中雖然有過幾部有「憲法」名稱的文獻，卻從未建立真正的憲政。中國共產黨扶持了8個「民主黨派」，這些黨派的所有經費、幹部的工資福利甚至辦報刊雜誌的全部經費，卻全部列入中國共產黨統戰部的預算，然後從政府財政預算中開支，這些「民主黨派」的幹部任命、級別與升遷也全由共產黨的人事部門與統戰部掌管。多年來，這8個「民主黨派」作為「政治花瓶」，為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裝點門面，對共產黨的任何荒謬決定（如鎮壓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1999年鎮壓法輪功）都無條件地鼓掌歡呼。除了這8只「政治花瓶」之外，中國民間的任何組織，哪怕是單純的學社，都被共產黨懸為嚴禁。2003年，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親中共學者在歡呼中國即將進入「民主憲政國家」的行列，但在中國任何有關憲政的討論仍然被當局嚴厲禁止。很難想像，由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領導人關起門來，自說自話主持修訂的「憲法」可能將中國帶入「憲政民主」國家的行列。

掌握軍隊仍然是中國領導人保持權力的最後手段。每一次政治高層換屆，軍委主席一直是中國高層領導人保持政治控制力的位置，即使是從未做過中國名義上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也一定要保持軍委主席的位置。與此同時，從9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對社會公共生活的干預越來越多，監控對政府持批評意見的知識份子及其他異議人士，成了國安部的日常工作，整個因特網（Internet）系統更是全部由國安部掌控。中國各級政府解決社會諸種矛盾的手段，愈來愈借助於警察系統的暴力鎮壓，警察執行公務過程中愈來愈隨意地使用暴力，2003年廣州大學生孫志剛被無端收押後暴死收容所事件即著名一例，許多黑社會組織背後的撐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腰者就是警察系統的官員。

中國是一個有5000年文明的古國，但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卻正好與傳統文明呈斷裂狀態。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執政者對本國的傳統文化否定得如此徹底。即使在史達林（Staling）時期，蘇聯共產黨也還對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的文明進步表示尊敬並引以自傲，而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將自己國家的文明作為「封建主義的垃圾掃進歷史垃圾堆」。從某種意義上來看，被斬斷文明之根的中國人其實已經喪失了精神家園，漂泊無依。而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最大「政治成就」之一，是摧毀了中國社會的中間組織——宗法組織，將原來的「政府－宗法組織－個人」這種社會關係簡化為由「政府－個人」，從而消滅了任何民間的組織資源。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頗具諷刺意義的是這一事實：正是源源不斷湧入的外資為中國的專制政府輸血，才使這個政權能夠延續其生命力。中國的大城市居民能夠沐浴外資帶來的雨露陽光，而9億農民生活於其中的農村卻正在痛苦地掙扎，到2003年初，中國的失地農民已經高達8,000萬人[2]。中國的農民為了擺脫這種毫無希望的痛苦生活，不少人選擇自殺結束生命。據統計，中國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自殺率的3倍，每年有15萬農民服毒自殺，50萬人服毒自殺未遂。據分析，貧困的煎熬與基層政府濫用權力壓迫是農民自殺的主要原因[3]。

中國人現在正在為自己的權利作艱苦的鬥爭，其中以農民的反抗最為悲壯。只能利用原始武器裝備起來的農民開始了有組織的抗爭。自90年代後期以來，這種抗爭每年雖然高達1萬多起，但總被武裝到牙齒的政府鎮壓下去。不少農民悲憤地說，現在因為政府擁有的武力實在太強大，只有鋤頭、大刀、幾把鳥槍的農民們「斬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木不能為兵，揭竿不能為旗」（中國古語，意謂「砍斷樹木作為武器，舉起一根竹竿作為義旗，號召天下受壓迫者反抗暴政」），只能忍了再忍。

中國政府就是坐在這樣的火山口上，迫使中國的媒體集體撒謊，謳歌「太平盛世」的「繁榮」。

二、墨寫的謊言塗飾著中國

然而，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最有嘲諷意味的是他們面臨這樣的現實：儘管他們的生活充滿痛苦，中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卻總是充滿「陽光」。這種「陽光」不僅照耀在中國境內，而且還延伸到中國境外。如果說歐美國家的記者偶爾還能夠寫上幾條暴露陰暗面的報導，那麼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則努力對中國政府盡美化之能事。2002年12月初，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召集的一次討論會上，我曾親耳聽到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一位姓史的華人教授在做學術演講時，用種種他「調查」得來的數據論證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對中國政府與現狀「表示非常滿意或滿意」。面對聽眾的質疑，他甚至洋洋自得地說：「連中國政府官員都對我講，你這個調查中談到的群眾對改革的滿意度比例，比我們自己做的調查還要高幾個百分點。我對這些官員打包票，我這個調查絕對沒有問題，是有科學論據的。」對我來說，在一次會議上駁斥這位學者的「科學論據」並不用花太大力氣，只需要指出中國政府從2000年以來頒布了兩個涉外調查法規（見第一章註10），明確規定境外機構不得自行調查，這種在安全部操控下取得的調查數據根本沒有可信度。但他的文章卻正在用英文出版，不僅成為他升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遷的基礎，還因其「學術外衣」誤導著其他學者的研究。

這當然與中國政府在海外的努力有直接關係。中國共產黨起家的「三大法寶」之一就是「統一戰線」，即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的勢力，用這些「統戰對象」的口向外界宣布中共的聖明。自從中國政府手中有了幾個錢以後，資助或者乾脆暗中出資創辦貌似獨立的華文媒體、華文學校與華人社團就是中共統戰工作的主要手段，中國政府從中嘗到了巨大甜頭，將三者稱之為中國政府統戰工作的「三寶」。

中國政府設在所有國家的大使館與領事館，其主要任務不是協助本國僑民解決困難，我已經看到不少華人在文章中抱怨自己在海外遇到困難，如因被偷竊而失去路費等，到領事館去求援而被冷淡地拒之於門外。所有中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從事「統戰」（統一戰線）工作，為塑造中國政府的好形象而努力。因為中國政府「金錢統戰」的結果，海外華文媒體已經有不少日益偏離新聞自由的軌道，對中國的報導越來越與西方主流媒體的價值判斷相反。2001年11月21日，美國詹姆斯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會刊《中國簡訊》（China Brief）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國的華語媒體」的文章，該文章指出了一個明顯的事實：中國政府花費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體，其主要策略有：投資控股、給予媒體在大陸的商業利益、安插人員等等。不少中文媒體被收買，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關中國的報導上愈來愈接近中國大陸媒體，所使用的語言也日益接近中國的官式語言。該文披露，當時美國主要的四種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和《僑報》，發行總量約七十萬份，但都受著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的控制。這些報紙對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來自新華社的消息總是全文照引，只改了一下標題，並將消息改寫成「本報訊」，立場與中共官方的聲音和觀點如出一轍，連口氣都越來越像。《星島日報》的老闆Sally Aw Sian已成為中共全國政協委員。

但中國政府在將對外國媒體的門關緊的同時，又對海外華文媒體象徵性地打開了另一扇門。2005年9月11日到9月13日，由地位與新華社相當的官方媒體中國新聞社主辦的第三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在中國武漢與廣州分別召開，武漢峰會據說有來自世界45個國家和地區的200餘家華文媒體的300多位代表，廣州峰會則有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的62家華文傳媒的80名代表。由於中國媒體的刻意渲染，中國人民可能真以為「華文媒體」正在成為世界主流，而不明就裡的中國媒體還煞有介事地報導海外華文媒體正在探尋與中國媒體的「合作之路」[4]。

但最誤導人的還是讓中國讀者誤以為參加會議的華文媒體真是什麼秉持自由精神的「獨立媒體」，盡管和參會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演的是什麼角色，據一位與會者事後感想，這種「有吃有喝、有玩樂有鼓掌、有照相有發言、有總結有資料、有禮物有歡迎有道別，一種典型的中國廟會式的『大會』」，對於移民海外者確實有吸引力。舉辦者意在「招安」，而參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現好，在眾多受招安者當中鶴立雞群，備受中國當局重視與關注，從而獲得更多的資源[5]。

不過，沒有人會指出一個事實，在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的幾百家華文媒體當中，有不少媒體事實上早就接受中國政府資助，更有媒體是中共自家創辦，只不過妝扮成獨立媒體的模樣罷了。

除傳統的媒體報紙外，中共還廣泛涉足電臺、電視業，操縱美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國一些當地的華語電臺、電視。中央電視臺第九頻道英語節目（CCTV-9）24小時不間斷透過美國有線時代華納公司的有線電視網在美國紐約、洛杉磯和休斯頓三城市播放，這是中央電視臺與美國有線時代華納公司達成的協定。自從開始這項合作之後，時代華納旗下的CNN對中共的態度馬上轉了180度的大彎[6]。

中國政府努力「統戰」的「成績單」看來很不錯，海外華文媒體對中國政府總是一片讚譽，如果偶有批評，那也只是對枝節問題與底層官員的批評，而且也主要針對那些已經被曝光或被逮捕的腐敗官員，屬於「小罵大幫忙」之類。「小罵」只是為了遮掩其真實立場，在讀者面前顯示「我們也是站在公正立場上的媒體」。中國政府的「靈活性」（其實只是放棄原則的機會主義）甚至體現在這樣一些小事上，在中國大陸，研究「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禁區，而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卻年年召開「知識青年聯誼會」，對這裡的知青研究並不禁止（因為小範圍內研究人才有限，發布文章雖多，卻只是一些回憶性質的散文）。最讓中共得意的是，2003年12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竟然將五年一度的人權獎頒發給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且不論鄧家子女在「六四」血案中的間接責任，僅僅是讓鄧朴方得以獲獎的那個「中國人殘疾人聯合會」本身，也只是鄧家子女斂財的工具，其所有的貢獻只不過是將他們透過各種方式聚斂而來的大量金錢吐出一小塊而已。

這個「人權獎」赫然掛在獨裁者脖子上，不僅讓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蒙羞，也讓中國人意識到，中共指稱的「國際反華勢力」與親中共勢力比較，前者的力量可能微弱得多。因為各種國際人權組織憑藉的只有道義力量，而中共政府的金錢外交有時確實能夠讓一些所謂的「人權活動家」與人權組織放棄原則，為獨裁者服務。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三、中國離政治民主化還有多遠？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中的部分精英總是在不懈地追逐「民主政治」，但「民主」宛如夢中女神，中國人只能看見女神的裙裾飄動，卻始終無法將這尊女神請入中國的政治殿堂。

但筆者堅信，隨著資訊傳播手段的改進與對外交流的日益開放，中國總有一天能夠實現民主化。至於這個過程的長短，卻還要看中國政府與反對力量之間的博弈，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則是中國的報刊、電視臺能否成為自由媒體，道理很簡單，一個資訊封閉的國家是無法實現民主政治的。

在民主國家，媒體是社會形勢變化的風向標，也是政府瞭解民意的重要管道。而中國「報喜不報憂」的傳媒管理原則，不僅誤國害民，中國政府自己最終也要受到這種愚蠢控制的報復。因為這種過濾資訊的方式最終導致資訊嚴重梗阻，下情無法上達，決策層無法瞭解社會實際狀況，做出的政治決策自然也總是「藥不對症」。中國近25年來最大的變化是社會觀念的變化。社會成員的隔代溝通已經極為困難，身居高位的政治高層最年輕的也已經有60歲。即使在一個資訊不受任何控制的國家裡，老一代人與快速變化的社會都會產生隔閡，更何況在資訊受控制的社會裡，隔代溝通更加困難。無法想像，一群垂老且故步自封的老年人能夠勝任地領導13億人口的大國。

透過控制媒體營造出來的「繁榮」固然能騙外界，但卻騙不了自己。90多年前，中國打倒帝制之後的第一個總統袁世凱想復辟當皇帝，引起了全國一片反對聲浪。他的大兒子袁克定一心想做傳承帝位的皇太子，決意不讓他的父親聽到任何反對聲音，為此假冒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順天時報》的名義，為他的父親一個人編印了一份專登擁戴帝制文章的假《順天時報》，讓他的父親陶醉在頌揚聲中。但這份只有一個讀者的《順天時報》最終愚弄的還是袁大總統本人。在當了103天的皇帝之後，一代梟雄袁世凱不得不在全國的反對聲中下臺，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中國政府目前控制媒體的做法，其實也只不過是效法袁克定印製假《順天時報》的做法，聊以自慰而已。

中國政府試圖控制國民思想的做法不止於控制媒體。從2005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的大學竟然啟用了特務學生制度，監督教師課堂言論！這種學生特務有個名詞，叫做「信息員」。據一位大學教師在博客裡介紹，「信息員」制度內容大體如下：學校當局從學生裡面挑選一些非常聽話的同學，安排到不同的院系，聽各科老師的課。

這些信息員都被派到各個院系。一位教師上課有點名的習慣，有一次上課，發現多了一位，反應非常靈敏：「你是學校派的信息員吧？」這位信息員非常厚道：「老師，我是信息員，來自工程學院，您上您的課，我不礙事。」

學生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大陸之外的人看了真不明白。但我可以將這番話的文化密碼解析一番。這位學生的話實際上是說：「老師，我來聽課只是職務行為，完成任務。我不會告發你什麼，請放心。」——這話我曾聽過，當年，我在新疆講學時，當地安全廳一位官員就列座於其中，晚上還要與我一道吃飯。為了安撫我，他讓他妻子也如此這般對我說。

信息員表現得好，就可以「加官進爵」，成為入黨積極分子。而黨員畢業以後，就業優先。

老師們並未遲鈍到不知信息員制度為何物，畢竟中國是一個政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治運動隔幾年要重來一次的「革命大國」，「運動經驗」都還豐富。這位教師記載說，當時系裡負責人給老師們傳達學校將要實行信息員制度的時候，他就已經意識到「這是明朝的東廠、西廠、錦衣衛制度！一所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居然在實行著朱元璋子孫們的制度。可怕，但是這是事實。」

這位教師接下來寫下自己的感觸：「在『可愛』的信息員面前，作為老師，您還能針砭時弊？有些老師本來就昧著良心，經常向同學們宣講中國形勢如何大好；加了一個信息員，良知未泯的老師，恐怕也要噤若寒蟬。這樣，充斥在學校課程上、教室裡的都是『一片大好』、『安定團結』的穩定和諧之聲。」愚弄學生唯一的後果是，畢業後，學生們發現社會現實根本就不是老師說的那回事，這個「可愛的社會」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如此嚴格控制媒體言論與人們思想，正是中國政府極端缺乏自信的表現。筆者現在生活的美國，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任何言論的國家。波士頓（Boston）、舊金山（San 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好幾個城市都設有「革命書店」（或叫「紅色書店」），專門出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著作。許多左派組織相當活躍，這些左派們的主要理論任務是批判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禁止過這些組織的活動，禁止過它們的自由討論、自由印刷、自由傳播。因為美國政府相信，美國公民只有充分、無畏地面對針對他們制度的一切辯護和一切批評，才適合實行自治。美國社會的共識是：公共討論的自由不可限制，限制這種自由等於摧毀公民自治的基石。我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訪問時曾有一個叫做「斯巴達克思」（Spartacus）的左派組織成員來找我討論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問題，言談中，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這位先生抱怨美國的「工人階級」因為活得太舒服，因此缺乏革命精神。我告訴他：「如果工人生活得很好，他們確實不需要革命。中國的工人、農民如果能夠吃飽飯，他們也根本不想革命。由於你們嚮往的社會主義制度讓中國人民吃夠了苦，受夠了罪，中國人民現在的最高理想是擁有一個你們這些左派痛恨入骨的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我還告訴他：「我在中國只是批評了政府的腐敗，就如此為中國政府所痛恨不容。如果你們活在社會主義中國，早就被關進監獄去了，因為你們天天在號召人們推翻政府，中國法律中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與『陰謀顛覆政府罪』，就是為懲治你我這種人設立的。你們熱愛的社會主義制度，從不給人以言論自由；你們痛恨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好保證了你可以痛罵它而不用坐牢的權利。請你們想一想，到底哪個制度好？」

允許各種反對力量活躍在自己的國土上，既是美國充滿魅力之處，也是美國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的主要原因。

當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做法還有從蘇聯學來的故智。前蘇聯就是一個佈滿格別烏特務的「紅色帝國」，公民的電話和信件隨時受到監聽。而監聽者以「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冠冕堂皇的藉口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前蘇聯作家索忍尼辛（Solzrenitzin）曾寫過一部政治小說《第一圈》，描繪的就是特務橫行、人人被迫說假話的「紅色帝國」蘇聯。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統治者認為，依靠監視、壓迫、暴力與恐嚇，就可以永遠維持蘇共的獨裁統治。然而，強盛一時的蘇聯帝國終於化為歷史煙塵，蘇聯共產黨也成為獨裁者的代名詞而受到歷史的唾棄。中國共產黨政府愚蠢地堅持步蘇聯共產黨後塵，除了讓整個中國為他們陪葬之外，不會有更好的前景。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中國有句成語，叫做「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中國政府嚴格控制資訊，正好比決策者用黑布將自己的眼睛矇上，成了看不見外部世界的盲人；而中國的媒體則好比一匹馬，駕馭它的決策者按「報喜不報憂」的原則實行獎懲，宛如給這匹馬的眼睛也矇上一塊黑布，於是，中國就在「盲人瞎馬」的導引下前行，向「深水池」一步步邁進。

四、一個民主的中國更能為世界文明做出貢獻

儘管中國政府的「統戰」工作卓有成效，一些海外人士或團體因為與中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無視中國正在發生的種種不人道事情，對中國人民的痛苦充耳不聞，只管為中國政府獻上廉價的「讚美詩」。但不管任何時代，那怕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總有正義人士會超越個人利益，關懷整個人類的福祉。

我無意多去評論屈從強權這類事情，因為在人類歷史上，屈從強權的事情每時每刻都在發生。我只想提及一些始終不渝地在為中國人權呼籲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如「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保護記者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記者無疆界組織」（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這些組織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蒐集發布的各種真實的資訊，始終是那些廉價「讚美詩」的剋星。也因為有這些組織的存在，中國政府用金錢收買的勢力才始終不能一統天下。就在2003年12月18日，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了2004年世界獨立國家自由評比報告，臺灣被列為全亞洲最自由的國家之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一，分數僅次於日本：中國則為亞洲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情況只比北韓及沙烏地阿拉伯略好。也因為有這些組織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向中國政府施壓，中國政治犯與良心犯的待遇才能夠比毛澤東統治時期有所改善。

我同樣欽佩那些在中國國內始終不向強權妥協的人士。我從那個國度出來，深知在中國要想堅持不向強權妥協，需要付出什麼樣的沉重代價，包括被「知識份子」群體被迫或主動地孤立，因為與「異端」的交往可能會使他們陷入不測之境，喪失安全感。本書列舉的那些因揭露腐敗而身陷囹圄的記者所做的努力，始終是照耀中國人良知不泯的一盞明燈。還有其他一些人士，也為資訊自由做出了獨特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例如，「法輪功」的劉成軍先生曾於2002年3月5日在長春的8個有線電視頻道插播了「是自焚還是騙局」等法輪功真相資料片，因此被捕入獄，在歷經了21個月的殘酷折磨後被迫害致死。劉成軍付出了生命代價，但許多人因此得知法輪功受迫害的真相。

中國的希望在一些為了自由與強權抗爭的勇士身上，這些勇士當然包括書中所列的那些為了新聞自由而付出犧牲的人，正是他們的努力在一點一點地改變著中國。我曾看過不少「二戰」時期迫害猶太人的歷史資料片，發現當初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歐洲不少國家都得到呼應，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時一地的短暫利益，可恥地順從了法西斯強權。我真誠地希望國際社會少一些為了利益而放棄原則的公司、團體或個人，因為中國人民需要國際社會民主正義力量的熱忱幫助。

一個建立在民主憲政基礎之上且政治清明的中國，比目前這個正處於極端腐敗、視本國人民如草芥，且在外交中毫無原則，唯利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是圖的專制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對於世界文明所起的作用要積極得多。

希望這本書能夠有助於揭開曚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神秘面紗，只有認識一個真正的中國，才能夠有效地幫助中國人民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

最後，我要提到美國的「中國人權」這一非政府組織，在它的資助下，我完成了一個關於中國的媒體管制的研究項目，該項目的研究報告已經由中國人權印刷成小冊子在有限的範圍內發行。正是因為這一研究項目，我才有機會清理自己在中國媒體業從事多年工作的種種體驗，並且閱讀了大量文獻與資料，從而加深了對世界各國媒體和中國的媒體管制歷史的理解，現在我撰寫的這本書就是在那一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完成的。在此，我再次向「中國人權」表示真誠的感謝。

（2004年1月初稿，2006年3月完稿）

---

1 Hannah Arend：《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聯經出版社（台）1982年出版。該書譯自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art Three, Totalitarianism。

2 應笑我：「中國土地憂思錄」，《泰山通訊》增刊第36期，2003年9月30日。

3 《中國青年報》2003年11月20日。

4 「羊城雲集傳媒巨子，全球華文傳媒峰會今開幕」，金羊網 2005-09-14 15:16:57，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9/14/con-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tent_983466.htm；「用漢語向世界敘述中國——為全球華文傳媒峰會而寫」，金羊網 2005-09-16 15:05:20

5 文揚：「中國政府和海外媒體的『招安』與『被招安』」，多維郵報，2005年9月22日。

6 「紅色政權在美國：媒體滲透」，《大紀元時報》，2004年5月19日。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附錄《書評》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美國《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中國：剿滅真相的國度

林培瑞（Perry Link）／著
著名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本文是為何清漣的新著《中國政府是如何控制媒體的》所作的書評，發表在2005年2月24日《紐約時報書評》。
林培瑞・楊莉藜／譯

2002年9月14日，不知什麼人把劇毒下在南京一家小吃店的食品裡，造成400餘人中毒。中毒致死者達到41人時，官方的新華社才登出了一條通知，告誡讀者當心南京的有毒食品。即使這樣一條新聞也很快被撤回，政府強令撤掉所有此類報導。有毒食品的消息通過打往海外的電話傳播開來，36小時之後，海外媒體開始刊登此類新聞，終結了中國國內的新聞封鎖。但到那時南京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了100多人。

在那段新聞管制期間，南京的民眾從當地的報紙和電視裡看到的是什麼呢？下面就是9月14日南京晚間新聞的三個頭條：

・南京召開再就業會議，引起全國熱情關注：下崗工人感謝總書記無微不至的關懷。

・一到三月中央稅收形勢全面看好。

・李鵬委員長訪問菲律賓並發表講話。

何清漣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新聞工作者，她的著作《中國現代化的陷阱》[1]揭露了90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掌控國有資源的官員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巧取豪奪的。現在，她又完成了一部新著來探討中國的新聞出版問題，重點圍繞著那些讓人倒盡胃口的新聞所引發的兩個問題來展開：真正的新聞是如何遭到壓制的？政府用來搪塞受罵的政治昏話給公眾思維帶來了什麼影響？

何清漣把這些問題放在最近興起的大眾傳媒業的背景下進行思考。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政府消減了對大多數出版商（不管是書籍、雜誌或是報紙出版商）的資金投入，直言不諱地告訴它們雖然在技術層面上它們依然屬於政府機構，但它們必須自負盈虧。這為出版商們帶來新的挑戰：它們既要取悅大眾又不能迷失政治方向。為了因應這一措施，很多官辦報紙開辦了晚報或「都市報」，刊登娛樂故事、時裝資訊、體育新聞，以及其他讀者喜聞樂見而政治上又不至於觸動禁忌的內容。到2002年為止，中國總數約達2000份的報紙中，有一半屬於這種性質。一般而言，它們的銷路比主流黨報要好，這類報紙賺來的錢用來補貼黨報的虧損。

這些新出版物的出現，使許多國外觀察者相信中國培育出了一種新的出版「自由」。中國政府也不遺餘力地培植外國人心目中的這份假象，因此對揭穿了皇帝新裝的何清漣決不會輕易饒恕。中國的每一種出版物，何清漣寫道，不管辦得多花俏，都要歸屬於某一個由國家控制的單位。私人投資者可以把資金注入出版界，但是在會計帳目上還要寫明是「借貸」而不是投資。宣傳部的官員允許報紙在許多問題上發表自己喜歡發表的文章，但是他們會仔細監控任何政治敏感的詞句。發表象棋錦標賽之類的東西，沒問題。要發表有關臺灣的東西，上級不言自明的政策是「你清楚該說什麼，不用我處處教你」。共產黨的目的是既要保護黨的利益，又要避免別人看出新聞是受到控制的。很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讀者更喜歡流行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刊物上那種生動活潑的筆調，而不是共產黨的套話空話，報紙愈是貼近大眾，愈是能更有效地完成黨的宣傳任務。因此，與十年前相比，中國的報刊在種類和範圍上呈現出更豐富的多樣性，但是要談「自由」，還根本算不上。

宣傳部還不時地對大眾傳媒進行公開批評。比如，去（2004）年4月30日，官方警告電視新聞主持人不得把頭髮染成橙色，不得穿緊身褲，不得過分裸露，因為這些做法都「不符合中國國情」。還警告說，主持人要講普通話，避免日漸流行的南方話，避免夾雜英語，比如「酷（cool）」。中共長期以來都擔心如果讓「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了諸如服裝、言語等方面，就可能產生更深刻的、顛覆性的效果。另外，「南方話」又是臺灣話的委婉表達法，而大陸人現在去羨慕臺灣的東西是不行的。不過，這樣的審查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溫和、短暫的，沒有人把它太當成回事兒。電視節目主持人只用把頭髮再染成黑色，過不了幾個星期，橙色的頭髮就又露出來了。

不過，何清漣也細緻描述了在過去的十年間當牽涉到嚴重的政治問題，記者又瀕於失控時，官方所採用的審查、撤職、停刊、解雇、恐嚇、騷擾、甚至殺戮等手段。她列出了禁書目錄、被關閉的雜誌目錄和勒令「整改」（即重新培訓，重新組織）的出版社目錄。她發現從1998到2002年間，有32名記者被捕入獄，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多。她還證明胡錦濤治下的新聞控制，一點都沒顯露出人們希望看到的那種鬆動跡象。

什麼東西能出版，什麼東西不能出版？答案很複雜，但多多少少都與共產黨的政權安危有關。批評政治領袖，哪怕僅僅是不太好的消息，有可能會引起對領導人的批評，就會被視為影響「穩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定」。一篇有關某個試圖在體制之外成立組織的報導，比如對中國民主黨、法輪功這樣規模不大的組織的報導，可能被視為具有「引發動亂」的作用。連一本名叫《降低農民負擔工作手冊》的小冊子，也遭到了禁止。這本小書只不過總結了憲法賦予農民的權利，政府查禁此書只是因為歷史的經驗顯示，飽受苦難的農民往往會揭竿而起。

中共政府雖然這樣蠻橫武斷，卻一口咬定自己是在按法律進行資訊控制。1988年頒布的《保密法》明令禁止造謠誹謗，或以其他方式煽動推翻政府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嚴禁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

《保密法》能派上很多用場。2002年，對一位名叫姜維平的記者的判決就援引了這部法律。姜被指控為「向外國人洩漏國家機密」、「煽動推翻政府」。其實，姜維平不過在香港發表了幾篇文章，揭露遼寧省大連市高層官員的腐敗現象。他的文章署的是化名，可是仍沒有逃過官方的眼睛，毫不留情地判了他八年徒刑。

姜維平的文章十分大膽，竟敢批評遼寧省省長薄熙來。薄熙來屬太子黨系，是已經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薄一波之子。中國的法庭見此情景不敢怠慢，風風火火地去幫助這樣的皇親國戚。何清漣還提到一個名叫馬海林的軍隊作家。2001年底，他竟然在《證券市場周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李鵬（中國最遭人討厭的總理，任期1988～1998）及其妻兒從國家控制的能源公司裡大肆圈錢的真相。中宣部立即發布了一條公告譴責這篇文章，並命令沒收所有印發出去的《證券市場周刊》。周刊的編輯們膽戰心驚地在接下來的一期上刊發了「更正」，沒料到連「更正」這一期也被全數沒收。其他提及此事的媒體也接到命令，要全部刪除相關文章。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2001年之前，何清漣一直在《深圳法制報》做記者。有一次李鵬的名字印錯了，這只是一時疏忽，還是誠心搗亂？對上層來說不算什麼事，可是報社的編輯被罰了款，還被迫寫檢查，作自我批評。

宣傳部有幾種方法來防患於未然。它每月編發一份簡報，叫做《時事報告》，列出了近期印刷媒體中出現的所有政治性錯誤。任何一種出版物如果經常出現在《時事報告》上，離關門大吉的日子就不遠了，因此編輯們都格外仔細地閱讀每一期的《時事報告》。如果有必要，宣傳部也會召集記者來參加「吹風會」。所謂的「吹風會」是用來向記者解釋一些關鍵問題的，比如，為什麼某一篇關於腐敗問題的報導等同於洩密，因此觸犯了法律。從去年開始，播音員必須按照一條新規章來製作電話交談節目：所有播放「群眾意見」的電臺必須採用一種設備，使打入的電話延遲20秒播出，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過濾有害資訊。節目主持人必須提高「政治覺悟」，加強「責任心」。如果電臺沒有那種必須的設備，就不能開辦電話交談節目。

如果警告、恐嚇和禁止不起作用，中共政權就採用更嚴厲的手段。何清漣描述了利用黑名單的主要方法。從50年代直到70年代，惹怒了政府的作家會遭到羞辱，比如受批評、禁止發表文章、出書，有時還會在「群眾運動」中遭到批鬥。他們被批鬥的情況公開後，產生殺一儆百的作用。80年代之後，這種群眾運動開始消退，90年代則完全消失。不過人們對那些人曾經被禁仍記憶猶新，因此這些事例的警示作用依然存在，提醒著人們可能會發生什麼。最近，黑名單的作用已經變得非常隱秘。名單一般是在編輯會議上口頭傳達的，編輯們受到警告不能把名單外洩，因為那是「國家機密」。何清漣本人在2000年也曾經上了黑名單，90年代發表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過她的作品的一些編輯告訴她，他們受到官方威脅，如果發表何清漣的文章，報社就會被封，如果敢把黑名單的事情透露給任何人，特別是何清漣本人，後果也是一樣的。黑名單的事情最近為什麼搞得這樣詭秘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因為政府要給外界樹立一個「自由」的中國形象。

如果一位編輯不服管教，就可能被定為「內控對象」。這就是說，他會被告知要負起責任，還要寫自我批評。後果雖然大家不願說出來，但心裡都明白。如果內控之後仍然沒有好轉，這位編輯很快會被解雇。有時，「失足者」的朋友也被動員起來勸說他迷途知返。一旦被開除，就意味著失去職位或者永遠被禁止進入中國各地的「文化戰線」從事任何工作。那些被解雇的編輯和被禁的作家，如果拒絕認錯（這裡何清漣寫的多半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們的檔案就會從宣傳機構的官員那裡轉到公安局和國安局官員那裡。便衣警察可能會搬進他的隔壁去住，跟蹤某個記者，或者破門而入，沒收他的地址簿和電腦，還要編造出一套謊言，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1994年出爐的一項措施，有人指出是江澤民幹的事，說：「要用非政治的手段來處理政治問題。」這就為濫用法律打開了方便之門——那些因政治問題觸犯了政府的編輯、記者可能以腐敗、欺詐、行為不檢點等等罪名遭到指控。何清漣提到《陝西青年報》的一位記者，名叫高勤榮，1998年他寫文章揭露了當地某項灌溉工程中的貪污和浪費情況。縣裡的領導把他抓起來，綁在黑屋的門後，又判了他12年刑，罪名是「受賄、嫖娼、欺詐」。1999年，河南省一位名叫張沖波的工人（並非記者）和另外一位作者合寫了一篇文章，描述他所在的縣如何「瘋狂建設」，致使許多百姓無家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可歸。後來，張被指控為「私分專項資金」。他所在的村子的黨支部書記對張的被捕十分憤慨，於是逕直去北京告狀。結果卻被誣告為「法輪功分子」鋃鐺入獄。另外一個經常用來指控記者的罪名就是「有海外背景」，即使你根本沒有。宣傳部工作組的一名成員告訴何清漣所在單位的編輯，說她曾經是「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而當時何清漣根本沒有出過國。2000年，《時代》雜誌和《金融時報》發表了有關何清漣的報導後，她所受的壓力才暫時有所減緩。

長期以來中國有這樣一種傳統：蒙冤受屈的中國人在下層無法申冤時，就可以求助於高一級政府來伸張正義。何清漣列舉了一些例子，說明那些在底層工作的記者相信，如果有必要，上級政府會和他們站在一起。不過她得出的結論是，最近這些年來這種信念有點放錯了地方。基層記者往往冒著極大的風險和地方官僚作鬥爭，結果卻發現上級領導情願和地方的實權人物保持一致。

何清漣發現這種現象在中國農村十分普遍。最近的十五年間，中國的鄉鎮變得愈來愈像封建時代的采邑，由一些半獨立的組織控制著，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規矩、政策、稅收、監獄，但沒有自己的記者[2]。對他們來說，最理想的狀態是「此地無新聞」，萬一有了新聞，最好是正面新聞。地方官員拒絕跟記者說話，而大部分民眾則是不敢跟記者說話。如果記者發現了官員胡作非為的證據，官方總是百般逼迫，而且往往獲得成功。2002年6月，兩位記者來到山東的一個村莊，那裡的村民們告訴記者他們的支部書記私設公堂，用酷刑對付群眾。兩位記者蒐集到了證據離開了那裡，路上被幾輛警笛嘶鳴的警車攔下來。他們被帶到黨支部辦公室，沒收了筆記本和膠卷。十幾個便衣警察當著宣傳部官員的面把他們痛打一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頓。後來他們到公安局去指認那些攻擊他們的人，結果反倒又挨了一頓拳腳。何清漣相信在這樣的毆打中，死人的事情時有發生。她的書中列出了幾個至今尚未破案的謀殺案，都是因為記者的報導惹怒了官方，結果遭到謀殺。書中的資料顯示，控告高層官員往往以失敗告終，因為維護黨的整體形象是各級官員的第一要務。

何清漣把中國記者的現狀概括為「戴著鐐銬跳舞」，這樣的比喻有時不免讓人沉思：既然鐐銬加身，再去跳舞還有什麼意義？揭露醜惡現象這項任務十分艱巨，但卻遠沒有得到人們的認可，相反，倒是常常給記者帶來災禍。為什麼不順著這個社會制度，僅僅報導些好消息，也乘機得到提升呢？如果記者遵守中國的遊戲規則，為官員和企業唱唱讚歌，要掙錢還是很容易的。不過，何清漣發現，許多富於理想主義思想的記者不顧個人得失，以極大的勇氣講出真話。這說明「為民請命」這樣的中國傳統美德，依然受到人們的敬重。最近這些年，普通中國人對腐敗、欺詐、仗勢欺人、財富分配不公等問題怨言愈來愈多。如果有一份真正不受政府控制的報紙，此類話題可以填滿整個版面。一位記者如果能把此類黑幕揭得比其他記者深入一點，就輕而易舉地成了公眾心目中的英雄。不過，要完成這樣的任務，記者必須想出一種在體制內周旋的手段[3]。在這個問題上，關係網起了作用。官僚們有他們的關係網，仗義執言的記者、編輯、出版商也有自己的同道，以此得到幫助，獲取資訊。那些富於冒險精神的記者如果在一個地方受到壓制，有時可以依靠這種關係在別的城市、別的出版單位找到工作。

此外，由於地方官員最關心的是本地區的情況，不受地方官員歡迎的新聞常常很容易在其他地區發表。比如，2000年春天，陝西省有五位農民來到省城西安，訴說他們得了「怪病」，結果卻查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明是愛滋病。衛生部門的官員讓這些農民所在地區的居民進行血檢，最後查出4%的人口HIV呈陽性。陝西省政府把這件事定為秘密，並下命令停止血檢。當地的兩名記者杜光利和王武聯繫到了遠在廣州的《羊城晚報》記者趙世龍。趙遠赴陝西，在杜和王的幫助下採訪了當地的群眾，回去後把報導發表在廣州的報紙上。惱羞成怒的西安官員把杜和王召來，質問他們：「你們怎麼認識趙世龍的？」按照法律這樣的問訊應該由宣傳部官員來做，但是這一次和往常一樣，依然是由公安局出面。揭露愛滋病真相，醫務人員因此可以及時因應，按理說杜和王無疑救了很多人的命，然而他們得到的報答卻是永遠從記者隊伍中開除，因為他們「涉嫌洩漏國家機密」。何清漣在書中說，她查閱了相關的法律條文，發現「根本沒有哪個國家把愛滋病當作國家機密的。」

何清漣還寫到湖北的一位教師，把40年代晚期以來中共報紙上刊登的支援民主與基本自由的文章進行耙梳整理，結果收穫頗豐。因為那時的共產黨正在反對國民政府的專制體制。然而，到了1999年，如果再講出「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這樣的話，就會被視為指桑罵槐，因為中國依然還沒有實現多黨制民主。於是，宣傳部的官員把該書列為禁書，作者也被列入了黑名單。同時還對出版該書的出版社進行了整頓，聲稱：「我們必須嚴禁出版此類用歷史攻擊現實的書籍。」

毛澤東時代，「思想控制」曾經大行其道。思想控制現在還起作用嗎？當新聞受到壓制，代之以實質上等同於政治廣告的東西時，大多數中國人是不是真的像共產黨經常教導他們的那樣，相信人權不過是西方帝國主義玩弄的手段？

對這些問題，何清漣很悲觀。她相信中共要掌握權力，需要把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公眾控制在無知和「半無知」狀態，因此他們嚴禁公眾討論有爭議的問題。這種戰略往往屢試不爽，不僅在國內如此，在國外也如此，因為外國人太容易接受中國官方的謊言。

一般來說，外國人對於中國「新聞」系統的運作所知不多，這一點何清漣說得很對。國際報業常常引用新華社的消息，彷彿它跟路透社、美聯社屬於同類媒體。事實上，新華社有兩種基本功能，不管哪一種都跟路透社不同。新華社的大多數報導是給中共領導人看的，因此處於保密狀態。專供最高領導閱讀的最密級報導（如《天安門密件》所示）[4]，都非常詳盡、準確，內容十分敏感，比如有關於四處蔓延的群眾示威抗議的報導，一般人永遠也讀不到。在製作這類報告時，新華社更像一個情報機構，而不是一個新聞機構。（事實上，新華社的一些工作人員本身就是以新聞工作為掩護的情報人員。）新華社的第二個主要功能，是小心翼翼地按照黨的意思挑選出一些新聞給民眾閱讀。這些報導，按照中共的套話就叫做「宣傳」，實質上是新聞與政治廣告的雜拌。

關於民眾在多高程度上接受新華社那歪曲事實的新聞報導，何清漣的看法也許太悲觀了。新華社對法輪功的宣傳戰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試圖消滅法輪功在民眾記憶裡的一切痕跡。不過，我敢打賭，如果明天共產黨完蛋了，用不了一個月，法輪功就又回來了。官方的宣傳如果和公眾的情感——不管是現有的或是潛在的——相吻合，宣傳效果最為顯著，中國狂熱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方面的例證。1999年5月7日，美國炸毀了——且不管是不是「誤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反美宣傳和民眾的反美情緒一拍即合。近幾個月來，新華社密集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說臺灣「回歸祖國」是歷史必然。這種一廂情願的報導簡直有點可笑，然而那種吵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吵嚷嚷的民族主義情感大宣泄似乎很受人歡迎。

在國內事務上，宣傳手段就沒有那麼容易被接受了。民族主義不再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通過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人們接觸到的腐敗和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平現象太多，民族主義很難在這一方面喚起人們的共鳴。標準的黨報，如《人民日報》，發行量急劇下降，依舊訂報的老客戶大都是長期以來掌握了讀報技巧的讀者。比如，他們看到了「南丹礦難英勇大營救」這樣的報導，會立即得出結論，在這次礦難中死傷十分慘重。

阿布哈里卜監獄的虐囚案顯示了中國國內解讀新聞的不同方式。虐囚醜聞被揭露出來時，新華社發表了一些聲明，如：「華盛頓自詡為國際人權衛士，現在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虐囚形象像重磅炸彈，炸啞了美國的惺惺高調，炸毀了美國虛假的正義」[5]。中國網路聊天室裡，大多數人都在重複著這些觀點，無疑，虐囚事件確實玷污了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國形象。但是，當中國人把阿布哈里卜監獄的虐囚醜聞和中國自己的酷刑相比較，人們得出的結論就不同了。「某些國家」的問題是，一位網路評論者寫到：「它們傷害了自己的人民，卻連錯都不願認，甚至連講都不讓講。」耶魯大學一位社會學研究生，名叫安托尼·薩皮爾，分析了2004年5月初貼在《人民日報》網站論壇上的500篇有關虐囚事件的評論[6]，發現人們的觀點「相差很遠」。約有45%的評論是反美的，33%的評論讚揚了美國的民主，因為美國公開地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如果受害者是中國人，而不是伊拉克人，人們的觀點分歧就不會這麼顯著。當年美國攻擊中國駐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炸死三個中國人，中國的反美情緒十分強烈、失常。何清漣論述了宣傳部有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時是如何鼓動反美情緒的，她擔心許多中國人學會了「仇恨」。這個詞說起來也許語氣太重了點。在我看來，大多數中國人的反美情緒是一種摻雜著嫉妒、敬畏和痛苦的混合物。他們認為，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最強盛的國家沒有給中國應有的尊重。他們痛恨美國，把美國視為一個競爭對手，但同時又希望自己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炸館事件發生之後，那些向美國大使館投擲石塊的學生裡，許多正在申請去美國讀書。有的中共領導幹部在公共場合煽動反美情緒，暗地裡卻把子孫送到美國，還在美國開了帳戶。

何清漣論辯說，如果把腐敗、社會不公、統計資料的摻假，以及環境破壞等問題考慮在內，中國的總體經濟成就並不像新華社所說的那麼輝煌。這些年來，由於中共是靠經濟成長（還有民族主義）來維持自己的合法性的，而經濟成長又依賴於國外投資（每年約有450億美元），因此黨需要盡可能地維持中國在外國投資者中的良好形象。這一點中共政權做得很不錯。看到外國人顯得那麼容易被欺騙，何清漣感到十分失望。有的外國人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明知不對，卻依然和中國政府合作，一邊接受中國政府的審查，一邊幫助製造假象，對此，何清漣也表達了蔑視。比如，雅虎公司2002年同意讓中國網路警察審查公司系統中的所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穩定」的資訊。

中國政府操縱了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實質上等於取得了雙重勝利。何清漣推論說，由外國人創造出的良好的中國形象，不管是外國的政治家、漢學家，或是像世界銀行這樣的機構，不僅誤導了外國人，也對中國人起到了宣傳作用。新華社定期選編一些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評價登報發表，讓中國人知道外界對共產黨的評價有多高。即使外國的評介不那麼積極，經過編輯之後，黨的形象也比原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作者所寫的要光輝。這一點希拉蕊和克林頓應該深有同感，因為他們最近出版的書，漢語譯本都在翻譯上作了手腳[7]。

互聯網在中國疾風暴雨般地發展起來，成為政府控制資訊的最大阻礙，1997年中國的互聯網用戶有620,000，現在的用戶，包括在家中上網或在網咖上網的，已經達到了8000萬。電子郵件靈活多變，收發快捷，不便控制，已經成為共產黨迄今遇到的最頭疼的傳播媒介。

不過，面臨的問題愈難，中共官員試圖控制它的努力也愈大。1996年，中國政府開始頒發條例，禁止利用互聯網傳播反政府資訊，但此後不久便意識到這種禁令根本起不到作用。何清漣描述了自1998年開始，國家安全部是如何招募大批有技術的大學畢業生來監控網路的。今天的中國，成千上萬的網警日夜在網上瀏覽，搜尋反黨資訊（國際特赦組織估計中國的網警達三萬，但是具體人數圈外人誰也說不清）。發現要剔除的資訊時，他們有幾種選擇。如果網站的伺服器在國外，就採用封網的方法，或暫時封，或徹底封死，有時也採用修改網頁的方法。如果伺服器在中國，他們就發一個警告，或者乾脆關閉該網站。在所謂的「敏感時期」，比如黨代會召開之前，或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周年紀念，關閉網站的手段較為常用。2003年春天，為了掩蓋SARS真相，Google列出的百家最熱門網站中，有42家被中國政府封掉。

如果僅僅通過網路手段無法達到目的，就會派出網警處理違規的網站或網頁製作人員。接下來的處罰就跟處理那些平面媒體的違規人員一樣了：「改正」、罰款、沒收資金和設備、關閉有關機構，極端情況下還逮捕相關人員。根據記者無疆界組織的報導，全世界共有69人因為使用互聯網而被捕的，其中61人都在中國。而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這61人中大多數被指控為「顛覆」罪，刑期從兩年到十二年不等。其中的四名服刑者已經死在獄中，都是法輪功習練者。

即使是這些措施也沒有能使政府嚴控互聯網。政府與互聯網使用者之間的貓捉老鼠的遊戲還在繼續進行。最近幾個月來，政府又採用了心理戰術，誘使互聯網服務商之間相互檢查對方的網頁，以滋生恐怖的方法，達到使人們自律的目的。

2002年8月，又頒布了新規章，要求中國的網路出版商要歸屬於一定的組織，要遵守規章，要建立編輯體系，指定一名「責任編輯」，監督發表的每一篇文章。從形式上看，這些規章只是把互聯網出版商和報業與其他媒體出版商同等對待，事實上，官方的意圖是清除個人網站。現在，至少兩個人，通常還會更多，必須為另外一方在網上的所作所為共同負責，這樣每個人都有動力監督別人，防止他們出錯。（類似的激發集體責任感的方法在中國古代早有運用，毛澤東時代達到高峰。）

此外，網站不僅要為自己貼的文章負責，還要為聊天室所有來訪者貼的文章負責。這樣網站管理人員其實在行使著政府的職能，監控著所有張貼出的文章。如果網咖的上網者發送或者接收有害資訊，網咖老闆可能受到處罰。在「敏感時期」，網咖和網站都會提醒瀏覽者小心，「敬請合作」等等。何清漣指出，這種方法意圖在人們心中造成一種錯誤推想，即，如果有人「犯了錯誤」，導致網站關閉，為這一災難性後果負責的是這個人，而不是政府。

2004年，政府方面新建立了「違法和不良資訊檢舉中心」，為檢舉「不良」資訊大開方便之門。不管是誰，也不管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寫信給jubao@china.org.cn[8]，向中國警察檢舉「不良」資訊。不過，用這種方法攻擊對手是不行的，因為不允許匿名檢舉。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中國最近出爐的互聯網規章有一條是「實名制」，就是上網者必須用真名進行登記，這自然加強了網路運用者的「自律」。2003年3月，中國政府要求中國的互聯網服務商和政府簽訂《中國互聯網自律公約》。大約有三百家服務商簽訂了該公約，雅虎是其中之一。

在結論部分，何清漣對「國家安全」這一術語進行了分析，觸及了最為敏感的問題。「國家安全」常被中國政府用來為自己封堵資訊，閉塞視聽及掩護。中國政府還聲稱，村以上的選舉無法成功，因為人們的素質太低。人民知識欠缺，太容易受感情或者偏見的左右，因此，這種狀態繼續存在下去，我們這些權力的主人就必須處於控制地位。這樣的邏輯不僅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而且自身循環論證，荒誕不經。中國政府說，我們必須以我們特有的壓制手段了來控制局面，因為人民太無知；而人民太無知又主要是因為我們不讓他們知道太多。這樣的結果，中國政府把它描述為「穩定」。但是，何清漣的著作得出的結論是，他們處心積慮的要去保衛的其實只是受到威脅的獨裁制度的安全。

---

1 見劉賓雁、林培瑞「大倒退？」《紐約書評》1998.10.8。

2 根據陳桂棣與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一書的資料，90年代中期，中國的農村稅收增長8倍，農民平均比城市居民交納稅款高出三倍。在有的鄉鎮，僅僅辦理結婚登記就需要交納多達14種費用。

3 一些親中共的西方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給不受中共控制的國外出版與電視也進入中國創造機會，何清漣對這種想法不屑一顧，稱之為「神話」。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4 參見Jonathan Mirsky's關於這些章節的評述，2001年2月8日。

5 「中國傳媒大談『虐囚門』」，BBC新聞，2004年5月13日。

6 「一些中國人從『虐囚門』看出積極的教訓」，《耶魯環球在線》2004年5月14日。

7 這種手段幾年來在中國大行其道，俗稱「出口轉內銷」。除了在國際間運用外，也用於國內。地方上的領導把新聞「出口」到北京的國家媒體，然後在當地援引北京權威們的話為自己的作為造勢。

8 主頁見：net.china.cn/chinese /index.htm。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日本媒體之推薦

《產經新聞》：揭露共產黨對傳播媒體的控制

美國紐約時報最新號中，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林培瑞撰文「中國：剿滅真相的國度」書評論文，針對任職普林斯頓大學的作者何清漣女士的中文著作《揭開中國的面紗》（編註：日本書名為《中國的謊言》）作介紹，事實上該書是摘自已譯成英文的《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一書的書評，單行本原著尚未在美國翻譯發行，該論文的英譯已在中國人權組織「中國人權論壇」刊載。

《產經新聞》：恐怖的中國媒體控制

本書揭露了中國對媒體及言論的控制，作者以自身的經驗對中國的媒體控管與輿論宣傳現況，作出致命的揭發。

中國共產黨扮演著大陸傳媒的喉舌，中國政府更是完全掌握著大陸所有傳播媒體。中國媒體對重要事件，皆完全採用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的消息或國營新華社的通稿，媒體僅能原稿刊登，傳達訊息而已，違反的話，媒體即被施壓。即使外國刊物的翻譯涉及批判中共當局的內容，出版者亦需刪除或改寫，此乃極為平常的事。唯有徹底隱瞞中共的醜聞，誇張中共的長處，才能維持中共政權的正當性，進而控制人民的意志。

本書對中共當局的資訊操作和媒體報導管制手法，採實證式的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詳細分析，是作者繼「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後，在日本第二次發行的著作，也是親身經歷中共文宣控制及報社記者身份的研究，剖析了中國社會腐敗結構的官僚體系，作者深入的分析比起前著更具說服力。

《經濟新聞》

本書暴露了中國大陸對媒體控制的內幕，而且資料詳實記載著媒體控制的策略，文章順暢易懂，是學者專家必備的工具書。

《週刊文春》

作者說「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會製造謊言、取巧的政黨」，老奸巨猾地輕易欺騙了西方媒體。

精采的本文，若仔細的閱讀，需花半日以上的時間，但卻會使人深陷廢寢忘食的內容之中。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並非胡錦濤所謂的「親民政策」，其本質是「愚民政策」，究其原因有二：一、源自中國的統治思想；二、學習蘇聯史達林時代的思想言論控制方法。中國古代皇帝愛用的「牧」一詞，即有「飼育」之意，換句話說，中國統治者把民眾當作家畜，國家的統治者認定統治百姓就像飼養動物一般，比起史達林、希特勒，更是青出於藍。

《周刊現代》

「中國的謊言」一書揭發了中國政府完全支配著媒體報導，處處壓制言論自由，造成許多人淒慘的命運及殘酷的人生。所謂「反政府」份子，反革命等罪名仍在社會中觸目所及。就連21世紀的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今天，以「洩漏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罪名，而遭入獄的媒體記的駭人景況，均是外界前所未聞的，卻是中國新聞同業人員所知悉的。新聞報導縱使在中國憲法中具有保障，但實際卻是以領導者為導向，是否事涉國家機密均由其論定之。本書列舉許多實例詳加介紹，又因作者本身因從事媒體工作，具有豐富的經驗，故能深入報導剖析，頗值閱讀。

《生活百科West》：中國共產黨的媒體控制法

中國的媒體被中國共產黨完全的掌握是眾所週知的，其軟硬兼施的操控手法，令人驚訝。

（劉義華／整理．翻譯）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
何清漣著. -- 初版. -- 臺北市：黎明文化，
2006[民95]
面； 公分
ISBN 957-16-0742-8（平裝）
1. 媒體 - 管理 - 中國大陸
541.83 95006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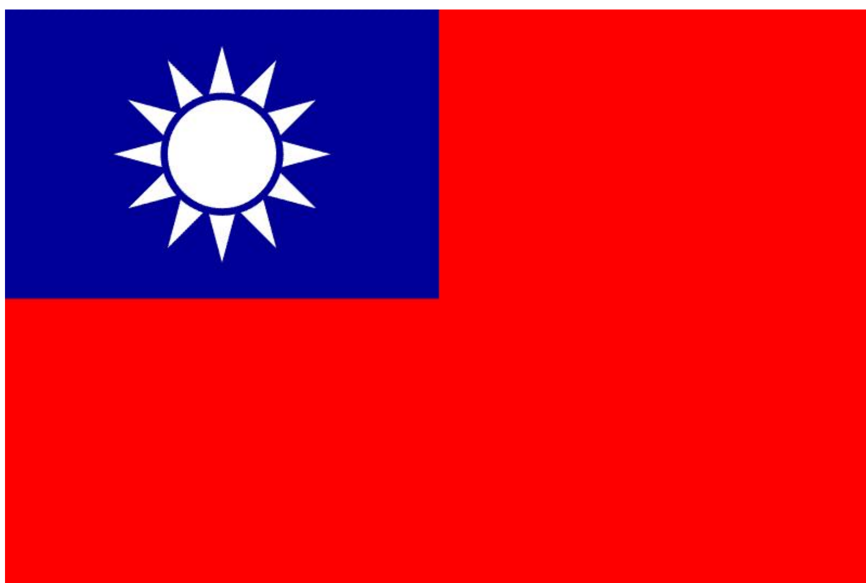
圖書目錄：890008(95-20)

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



作者◎ 何清漣
董事長發行人◎ 林國棟
總經理◎ 黃穗生
副總編輯◎ 羅愛萍
編輯◎ 羅容格・簡明玉
校對◎ 何清漣・侯孟華・羅容格
美術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工作室

出版者◎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3樓
電話：(02) 2382-0613
發行組◎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482巷19號
電話：(02) 2225-2240
郵政劃撥帳戶：0018061-5號
臺北分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9號
電話：(02) 2311-6829
郵政劃撥帳戶：1373264-3號
臺中分公司◎臺中市市府路39號
電話：(04) 2220-1736
郵政劃撥帳戶：0286500-1號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左營區南大路4號
電話：(07) 587-1322・587-1572
郵政劃撥帳戶：0044814-9號
公司網址◎ http://www.limingco.com.tw
總經銷◎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和中山路二段366巷10號10樓
電話：(02) 2249-6108
印刷者◎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6年5月初版
定價◎ 新臺幣4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換書
ISBN 957-16-0742-8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大陸學者以生命為代價所揭發的中共內幕
看禁书就上禁书网：http://www.bannedbook.org
讓您徹底了解這個剿滅真相的國度

中國政府說：「我們必須以我們特有的壓制手段來控制局面，因為人民太無知；而人民太無知，又主要是因為我們不讓他們知道太多。」這樣的結果，中國政府把它描述為「穩定」。但是，何清漣的著作得出的結論是，他們處心積慮的要去保衛的，其實只是受到威脅的獨裁制度及安全。

——紐約時報書評 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

某些外部觀察者相信，與過去相比，中國的媒體正愈來愈自由。何清漣在這部研究報告裡，以她擅長的深度分析揭示了中國媒體界的黑暗真相。她指出，中國的媒體雖然比以往多樣化、商業化了，但它在政治方面仍然被黨的監控系統熟稔地嚴密控制著。沒有人比來自中國的研究者何清漣更有資格來揭露這部共產黨的媒體控制機器。

——黎安友教授（Andrew J. Nathan）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主任，1919年級教授(Class of 1919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如果你希望知道中共控制媒體的全貌，如果你想知道大陸記者被整肅的悲慘狀況，你一定不要錯過這本書！這本書的價值不僅是一部資料豐富，解析透徹的著作，它更是一個不向強權妥協、並已付出沈痛代價的知識份子的生命告白！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　張錦華教授

作者曾經是局內人，但目前不得不是局外人，她以相類於其知名著作《現代化的陷阱》的筆調與豐富素材，通過了親身的經驗篩選，以更系統化及更具有歷史縱深的視野，導引我們認識中國的傳媒。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　馮建三教授

作者分別從歷史的發展、法治的限制、記者的掌控、消息的封鎖、網路的監控及意識型態的傳播等角度，探討分析中共領導人操控媒體及資訊的各種手段。誠為有意了解當前大陸的政治、社會及新聞報導現況的絕佳材料，值得關心這些議題的人士或團體閱讀。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王高成教授

中共自二○○三年，公開宣示要進行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其目的即是處心積慮地思考如何控制媒體與輿論，強化內部民眾對中共的向心，進而引導國際輿情作對其作有利的支持。本書所舉實例幾乎無一不與此一政策息息相關。

——前國防部少將軍事發言人・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吳奇爲教授

